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学派 学说

诸子百家

指先秦至汉初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。后用作当时各学派的总称。战国时已有“百家”之称。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根据西汉刘歆《七略》，将儒家经典列入《六艺略》，另在《诸子略》中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等十家，又著录各家著作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”。后概称“诸子百家”。

九流

亦称“九流十家”。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。西汉刘歆在《七略·诸子略》中，把先秦和汉初诸子思想总括为十家，即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、名、纵横、农、杂、小说。除小说家，称“九流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”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“刘向父子，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。”李贤注：“九流，谓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。”

六家

先秦汉初的六个学派。西汉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将先秦至汉初的各种学派分为“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”六家。唐代刘知几提出的六种史书体例。分《尚书》记言，《春秋》记事，《左传》编年，《国语》以国别，《史记》通古纪传，《汉书》断代纪传，合称六家。

儒家

孔子创立的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游学于六艺之中，留心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。”孔子学说以“仁”为核心，以“礼”为准则，谓“仁者爱人”，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。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重教化，轻刑罚，认为“政者正也”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（同上）。孔子创设私学，周游列国，以“诗书礼乐”教弟子，从游者达三千人。当时即有“圣人”之称。战国时，儒、墨两家并称“显学”。儒家分为八派，影响最大者为孟轲、荀况二派。孟轲，倡“性善”说，谓“仁义礼智”为人心所固有。主张“行仁政”，尊王道而贱霸道。其教育思想以“扩充”固有善性为基本观点，要求“反求诸己”，“深造”、“自得”。相信教育有方，则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荀况集先秦诸子之大成，而以儒学为旨归。倡“性恶”说，认为礼义非天性，乃生于人为。政治上主张王霸结合，“以不敌之威，辅服人之道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。教育上主张用礼义陶冶和改变人的本性，“化性而起伪”（《性恶》）。孟荀在教育观上存在重内发和重外塑的明显分歧，但都肯定环境与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。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与《学记》反映出战国末期孟、荀教育思想融合的趋势。及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后，儒学在封建时代文化教育发展中遂居于主流和正统地位。汉代以董仲舒、何休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引讖纬以阐发儒经的“微言”、“大义”，为封建大一统提供论据；以刘歆、马融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着意于名物训诂，重在经籍的考证。东汉末年，郑玄以古文经为主，兼采今文经，“遍注群经”，集两汉经学之大成。从西

汉开始，设太学，置五经博士，儒家经典遂成为士子必读之书，人才选拔亦以儒学为依据。魏晋时期，王弼、何晏等以老庄之学解释儒学，倡为玄学，薄名教而任自然。宋明时期，学派林立，儒学在与佛、道思想交互影响中，产生了以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、朱熹为代表的“程朱理学”和以陆九渊、王守仁为代表的“陆王心学”。程朱重“道问学”，“居敬”、“穷理”；陆王重“尊德性”，“发明本心”；而以“存天理”、“灭人欲”为共同宗旨。他们所说的“天理”即是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道德的最高准则。朱熹取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编著《四书集注》，元代开始用于科举考试，流行最广。清代有重“义理”的宋学，亦有重“考据”的汉学，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，后者更多少受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影响。近代魏源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结合西学，阐发今文经学，为变法维新改革教育制度制造舆论。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，又产生当代的新儒学，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冯友兰等。

儒家八派

战国时期儒家分化而成的八个派别。又称“八儒”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：“孔墨之后，儒分为八。”“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”子张即颛孙师，漆雕氏即漆雕开，为孔子弟子。子思即孔伋，孔子之孙。孟氏即孟轲，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。孙氏即荀况（又称孙卿），长期讲学于稷下学宫。以上五派的代表人物是明确的。其余三派指谁，则尚难判定。颜氏，或曰当是颜渊。梁启超则说：“孔门颜氏有数人（按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颜氏弟子共有八人），最著者为颜渊。然颜渊先孔子卒，是否有弟子传其学，无可考。此文颜氏之儒不知出谁何也。”（《饮冰室专集·韩非子 显学篇 释义》）。仲良氏亦无可考。或谓即陈良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：“陈良，楚产也。悦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学于中国。”乐正氏一说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，一说指孟子弟子乐正克。八派中影响最大者为“孟氏之儒”与“孙氏之儒”。

八儒

见“儒家八派”。

孔孟

孔子与孟子的合称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被尊为“圣人”。孟子传孔子之道，在战国时期为儒家八派之一。他著有《孟子》七篇，以“圣人之徒”自命。西汉时开始尊崇儒学，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一度列于学官，置博士。北魏《元昭墓志》已出现“孔孟”并称。至唐，韩愈攘斥佛老，叙儒学道统，称孔子上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传，孔子歿后，孟子独得其宗。宋代理学家，益推尊孟子，称“孟子大贤，亚圣之次也”（朱熹《孟子叙说》引程子语）。朱熹合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宋以后成为通行的教科书。官方评论说：“有四子之书而后《五经》之道备；四子之书，得《五经》之精义而为言也”（《皇清文献通考·经籍考四》引康熙帝语）。“孔孟之道”由是成为儒学的代称。

思孟学派

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学派。“思孟”指子思（孔子之孙孔伋）和孟轲。孟轲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。荀子评先秦诸子有“子思倡之，孟轲和之”之说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。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篇为子思遗著，阐发孔子

的中庸之道。称“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！”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”。倡天赋人性论，主张教育应循天性之自然。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提出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学习步骤，认为依此步骤坚持不懈，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修养的“成功”。孟轲明确提出“性善”说，谓“仁义礼智”乃人心所固有，教育的作用即在存心养性，使处于萌芽状态的仁义礼智“四端”，得到充分的发展。相信教育有方，则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宋代朱熹取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编著《四书集注》，从元代开始科举考试主要根据此书。明代更尊子思为“述圣”，孟子为“亚圣”。思孟学派由是被奉为儒学正宗，影响深远。

墨家

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。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创始人为墨子，名翟，鲁国人（一说宋国人），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（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），聚徒讲学，而发展成为儒家的反对派。批评儒家崇尚周礼，“靡财而贫民，伤生而害事”；服膺夏禹治水，“身执畚锸，以为民先”。不同意孔子对待历史文化“述而不作”的保守态度，主张“古之善者则述之，今之善者则作之”（《墨子·耕柱》）。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，提出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“尚同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、“非乐”、“非命”十大纲领，“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，建立一个理想的和平互利的社会（《墨子·兼爱下》）。墨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。其首领称“巨子”。巨子再指定自己的继承人。据考，墨子之后，继立的巨子有禽滑厘、孟胜、田襄子、腹 等。弟子必须服从巨子的命令，奉行墨家的教义。史称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”（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）。墨子要求“有道者劝以教人”。不赞成儒家恭己以待，“叩则鸣，不叩则止”；认为教人应该积极主动，“遍从人而说之”，“虽不叩必鸣”（《墨子·公孟》）。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“四科”之教（“德行”、“言语”、“政事”、“文学”），提出三条人才标准：“厚乎德行，博乎道术，辩乎言谈”（《墨子·尚贤上》）。墨子死后，墨家分为三派：“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。后期墨家克服了墨子学说中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等迷信思想，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空前的进展，见于《墨经》的涉及到几何学、力学、光学、声学等许多领域。几何学方面讲到点、线、球体等概念。力学方面讲到力的性质、运动，力的平衡等。光学方面讲到光是直线进行的原理以及影的形成、光与影的关系、光与光源的关系、影的大小的形成和平面镜、凹凸镜中物与像的关系等（钱临照《论墨经中关于形学、力学和光学的知识》，载《科学通报》1951年第2卷第8期）。在教学上最早用定义的形式解说概念，如：“圆，一中同长也。”意即球体只有一个中心。中心到球面的距离相等。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原理，如用针孔照相匣证明倒影的形成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墨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。清末以来，学者才注意研究。墨家著作校注本有清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，近人梁启超《墨经校释》、高亨《墨经校注》等。

后期墨家

又称“别墨”。墨子学说的继承者。出现于战国中期和后期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载，墨子死后，墨离为三：“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”。《庄子·天下》又载：“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获、

己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而倍谯不同，相谓别墨。”保存在《墨子》中的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六篇是后期墨家的著述，称为《墨经》，又叫《墨辩》。它反映出后期墨家继承墨子“兼爱”思想，发展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，形成颇具特色的墨家辩学；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，包括数学、力学、光学、声学 and 机械制造等，更获得空前的进展，并成为古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真正开创者。《墨经》校注本有梁启超《墨经校释》、高亨《墨经校诂》、谭戒甫《墨经分类译注》。参见“墨家”。

别墨

见“后期墨家”。

孔墨

孔子和墨子。亦指儒家、墨家学派。战国时同为“显学”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：“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……故孔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墨。”

道家

先秦学派之一。始创于老子，继之者为庄子与稷下黄老学派。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为“九流”之一。它以自然无为之道为其学说的中心，以把握道之全体为教育理想。主张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（《老子·二十五章》）。否定教育的社会功能，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教。强调向内化知的直觉主义学习过程，通过学习自然而返归与保全人的自然素朴本性，把自然无为的品质的获得看作最高的理想人格。认为善者为师、不善者为资；生有涯而知之无涯；德有所长形有所忘；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。在此一系列有关师资、求知、美育问题的论述中，含有深刻的辩证法。以慎到、田骈、环渊等为代表的稷下黄老学派，“学黄老道德之术”，而在教育思想上兼容儒、墨、法诸家。主张“重士而师有道”。主要著作有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经法》等。

老庄学派

先秦道家的流派之一。由老子和庄子创立。把自然之道作为万物本源及其规律。以道之自然无为为教育目的。重视“不言之教”。从反礼教的虚伪性以反对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伦教育，提倡自然主义教育。要求摆脱经验知识的束缚，实现对自然本身的直觉体悟，通过学习自然而返归与保全人的自然素朴本性。由此分别提出以“观”、“明”、“玄览”和“接”、“谩”、“神”等由外及内、向内化知的学习过程论。在美育方面，主张“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”（《庄子·渔父》），把个体的自由发展看作是最高的美与善。并认为，美与丑是相对的，“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”（《德充符》）。在道德修养上，认为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”（《老子·五十一章》），主张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”（《老子·二十一章》）。提倡“贵柔”、“不争”、“知足”、“无己”、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等品德，通过见素抱朴、治事如啬、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，培养体现自然无为品质的理想人格。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。著作有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。

宋尹学派

先秦道家流派之一。代表人物为宋钘、尹文。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不累于俗，不饰于物，不苟（苛）于人，不忤（嫉）于众；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

命，人我之养，毕足而止。以此白（明）心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宋钐、尹文闻其风而悦之。”二人俱游稷下（尹为宋之弟子）。承继老子自然之道的思想，揉合法家、儒家，以法于道而为仁义礼乐的根据，变自然法则为与法相联系的社会法则。主张“气道乃生，生乃思，思乃知”的认知路线，强调排除主观成见（“别宥”）、遵循客观规律即“静因之道”的认知原则。倡“情欲寡浅”、“禁攻寝兵”。或认为此学派属于齐法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“小说家”著录《宋子》十八篇，于“名家”著录《尹文子》一篇，均佚。今本《尹文子》是伪书。可供研究的资料，散见于《孟子·告子》，《庄子》的《天下》、《逍遥游》，《荀子》的《非十二子》、《正论》，《韩非子》的《显学》，《吕氏春秋》的《去宥》、《正名》等。《管子》中的《心术》上、下与《白心》、《内业》四篇是否为宋、尹遗著，尚有不同意见。

黄老学派

先秦道家的流派之一。代表人物为慎到、田骈、环渊等。“学黄老道德之术，因发明序其旨意”（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），主以讲授君子“无政可以得政”之道术“以干世主”。主张“重士而师有道”。学习上要求“虚静谨听”。认为“百言有本，千言有要，万（言）有葱（总）”；“一者，道之本也。”因此，得道之本，即能“握少以知多”（均见《经法》），掌握整个知识体系。教学上提倡“唯一不失，一以驷化”的原则与方法。此派与老庄学派不同之处在于它已兼容儒、墨、法诸家思想。思想资料散见于《史记》的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、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及《经法》等。

法家

先秦的学派之一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“九流”。起源于春秋初期。管仲相齐桓公，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”。他把“礼义廉耻”看作立国的“四维”（四根大绳），又认为发展生产是基本条件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（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）。主张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四民分业”，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，使子弟从小习于本业，不见异思迁，以达到“其父兄之教，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，不劳而能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到战国时期，形成法家学派。代表这个学派的主流人物的为商鞅、韩非等。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一切社会制度必须改变，因此反对“法古”、“循礼”，称“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。认为立国之本在于耕战，主张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，“禁游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”（《韩非子·和氏》引商鞅之教）；在全国施行统一的法制教育，利用人们的“自为”（自利）心，以赏罚为手段，“使民之欲利者，非耕不得；避害者，非战不免”（《商君书·慎法》），形成“喜农而乐战”的社会风尚。并认为只有通过耕战才能造就人材（“举事而材自练”）。另有“齐法家”，也主张法治。在教育方面，倡言“反民之性”，“民欲佚而教以劳，民欲生而教以死”，相信如此就能达到“国富”、“威行”（《管子·侈靡》）。与商、韩不同的是：齐法家虽强调法治和法制教育，但并不排斥礼义教化。仍认为“治世之时，德行必有所是，道义必有所明”（《管子·法禁》）。其思想渊源于管仲，犹为明显。今存《管子》中少数篇目如《牧民》、《形势》、《乘马》、《权修》及《大匡》、《中匡》、《小匡》等保存了管仲遗说，其他多是战国齐法家的著作。

杨朱学派

战国时期学派之一。近于道家。创始人杨朱（《庄子》中有阳子居，《吕氏春秋》中有阳生，一般认为即杨朱的别称）。魏国人。孟子称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人不归杨，则归墨”，或未免夸大，但可以推知这个学派在当时必很有影响。它没有著述流传，其言论事迹散见于《孟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。由于史料不足，难于把握它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概况；但可以肯定，它的主旨是从个人本位出发，提倡“贵己”、“为我”、“轻物重生”，把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看作高于一切。孟子以杨、墨作对比说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；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，利天下为之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又说：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韩非也批评这一派人“轻物重生之士”（韩非子·显学）。可见这个学派与儒家和墨家在伦理观和教育观上的严重分歧。其后学有子华子、詹何等。子华子曾说：“全生（六欲皆得其所宜）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（屈辱偷生）为下”（《吕氏春秋·贵生》）。詹何对楚王问“为国”曰：“何闻为身，不闻为国”（《吕氏春秋·执一》）。他们的言论《庄子》亦有记载。论者谓“杨朱一派的后学，可以自由来往于庄、杨之间，这就是他们的特色”（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第348页）。《列子》有《杨朱篇》，为后人依托，不代表杨朱思想。

稷下道家

见“黄老学派”。

纵横家

战国时期学派之一。主要从事外交活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“九流”。代表人物为苏秦、张仪等。这两人皆学于“鬼谷先生”。在七国纷争，“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”的历史条件下，苏秦倡“合纵”，谋联合六国共拒秦国；张仪倡“连横”，谋说服六国共事秦国。汉刘向说：“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……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。是以苏秦、公孙衍、陈轸、代、厉（苏代、苏厉，皆苏秦之弟）之属，生纵横（南与北合为纵，西与东合为横）短长之说，左右倾侧。苏秦为纵，张仪为横。横则秦帝，纵则楚王”（《战国策书录》）。齐国稷下学宫多“策士”，其议论，辩术多与纵横家相通。《汉志》著录纵横家言有《苏子》三十一篇、《张子》十篇，已佚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有苏秦书信及游说辞。刘向删定的《战国策》（作者无可考），是研究纵横家的重要资料。此书保存了大量的纵横家言；也记有与之相反的非议，如吴起主张：“破横散从（纵），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。”

农家

战国时期学派之一。注重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“九流”，谓“农家者流……播百谷，劝农桑，以足衣食”。班固云：六国诸子“道耕农事，托之神农”。著作有《神农》《野老》等，今不传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有奉行“神农之言”的许行和他的门徒数十人“皆衣褐、捆屨、织席以为食”。又载：儒家门徒陈相见到许行十分高兴，“尽其所学而学焉”。他对孟子称道许行之言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饷飧而治”，与孟子进行了一场有关社会分工问题的辩论，反映出这个学派以农为本的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。当代学者认为《吕氏春秋》的《上农》、《任地》、《辨土》、《审时》四篇，保存了农家学说的一部分。其中讲到土地使用、整地做畦、中耕除草、土壤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等（杨宽《战国史》第二章）。

兵家

先秦初学派之一。研究军事并从事军事活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分兵家为兵权谋家、兵形势家、兵阴阳家、兵技巧家四类。著录之书有《吴孙子》（即《孙武兵法》，又称《孙子》）、《齐孙子》（即《孙臆兵法》，佚）、《吴起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李将军射法》等凡五十三家。宋元丰年间，以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尉缭子》及《司马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李卫公问对》颁于武学，名曰《武经七书》，以后武科即用以试士。清夏振翼依《五经》讲章例，为之训释，称《武经体注大全会解》，有坊间通俗本流传。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，其中有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六韬》和《尉缭子》。

阴阳家

战国时期学派之一。倡阴阳五行学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“九流”。说它盖出于唐尧掌天文、历数的“羲和之官”。“五行”指水、火、土、金、木五种物质，被看作是构成万物的原素。春秋战国时产生五行相生（木生火、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）相克（水胜火，火胜金，金胜木，木胜土，土胜水）的思想，具有唯物主义因素。到战国末，以邹（亦作驺）衍、邹奭为代表的阴阳家提出“五德终始”的学说，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是五行之德转移循环所致，又盛称“襍祥度制”，遂引向唯心主义。这两人都是稷下学宫的“先生”。邹衍“尽言天事”，“其语闳大不经”；邹奭修衍之学，备加雕饰：故有“谈天衍，雕龙奭”的称号。邹衍为齐所重，名扬诸侯，“适梁，惠王郊迎，执宾主之礼；适赵，平原君侧行撇席（以衣拂席，表示尊敬）；如燕，昭王拥彗（扫帚）先驱，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，筑碣石宫，身亲往师之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。阴阳五行学说为汉代董仲舒所吸取，是讖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对汉以后的影响也很深远。论者认为：“如果不理解阴阳五行学派的世界观、知识论和逻辑学，则对于自汉以下的儒家哲学也不能有充分的理解”（侯外庐等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第646页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阴阳家著作有《邹子》四十九篇、《邹子终始》五十六篇、《邹奭子》十二篇，均佚。关于邹衍的片断记载散见于《史记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，侯外庐等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一卷《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》一节有详细摘录。

名家

一称“形（刑）名家”、“辩者”。战国时期论辩名实（概念与事实）关系的一个学派。司马谈称其“控名责实，参伍（错综比较）不失”（《论六家要指》），要求名称与实在相当。渊源于春秋与孔子同时的邓析。他在郑国创办私学，作《竹刑》，教人学讼。针对郑国旧法，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”（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），“学讼者不可胜数”。战国时刑名之学大盛，主要代表为惠施与公孙龙。惠施倡言“合同异”，注重概念外延的扩大，强调事物同异的相对性。公孙龙主张“离坚白”（区分石之坚与石之白），注重对概念内涵的分析，区别个别与一般。具体与抽象，强调事物的特殊性。二者各有所偏，而共同为先秦形名之学奠定了基础。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以善辩驰名者大有人在。如：兒说，“持白马非马也，服齐稷下之辩者”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）。田巴，“离坚白，合同异，一日服千人”（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正义引《鲁仲连子》）。先秦诸子中虽不以形名名家，如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韩非等，但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也包含着各有特色

的形名思想。孔子最早提出“正名”，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荀子的《正名篇》是“正名”思想的系统阐述。后期墨家的《墨辩》则是先秦形名思想的批判和发展的高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于名家的著作有《邓析子》、《尹文子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惠子》等；除《公孙龙子》外，皆佚。

杂家

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思想的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：杂家者流“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”（颜师古注：“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。”）。说明这个学派的产生是适应建立封建“大一统”的需要。代表著作有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。《吕氏春秋》是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门客共撰。其教育思想主要倾向于儒家。清汪中《吕氏春秋序》说“《劝学》、《尊师》、《诬徒》（一作《诋役》）、《善学》（一作《用众》）四篇，皆教学之方，与《学记》表里。《大乐》、《侈乐》、《适音》、《古乐》、《音律》、《音初》、《制乐》皆论乐……凡此诸篇，则六艺之遗文也”（《述学补遗》）。《淮南子》为汉初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合著，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。如言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（《主术训》）；“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”；“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，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”（《本经训》）。这类议论，随处可见。两书都保存了远古以来大量的历史传说和记载，为治史者所重视。

小说家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为“诸子十家”之一。“小说”一词渊源于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（求高名），其于大道亦远矣。”意谓远离大道的浅薄之言。不同于后世讲故事的小说。《汉志》著录小学家书十五种，有《伊尹说》、《周考》、《师旷》、《青史子》、《宋子》、《天乙》、《黄帝说》、《封禅方说》、《待诏臣安臣未央术》、《待诏臣饶心术》等，包括先秦汉初的传记、琐言以及巫医、术数之类的著述，内容很杂，被认为是“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者之所造”，无足观者，故摒之于“九流”之外。

齐学

汉初经学流派之一。经师都是齐人，故名。其学大抵混合阴阳术数，而以灾异说经。如《尚书大传》之“五行”说，《齐诗》之“五防”说，《公羊春秋》之“灾异”说等。主要学者有伏生、轅固生、胡毋生等。

鲁学

汉初经学流派之一。经师都是鲁人，故名。主要经籍有《鲁诗》、《鲁论》等。《鲁诗》为鲁人申培公所传。申公受《诗》于浮丘伯，著有《鲁故》二十五卷，《鲁说》二十八卷，今皆佚。鲁人所传《鲁论》有二十篇。鲁人高堂生传《礼》。

今文经学

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流派。与“古文经学”相对。以汉时通行的隶书抄录的经书为今文经，以古代篆文写的称古文经。两种经书不仅书写字体不同，字句、篇章、解释及所记古代制度、人物评价也多有异处。汉武帝立太学，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，称为“官学”。博士所教授的经书均为今文经。今文经主“微言大义”，维护封建“大一统”。汉初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。他传授的经书是《春秋公羊传》，阐发“奉天法古”、“天人感应”

的神秘主义思想，成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。清皮锡瑞谓：“汉时今文先出，古文后出；今文立学，古文不立学。汉立十四博士。《易》：施（雠）、孟（喜）、梁（丘贺）、京（房）；《尚书》：欧阳（生）、大小夏侯（胜、建）；《诗》：鲁（申公）、齐（轅固）、韩（婴）；《礼》：大小戴（德、圣）；《春秋》：严（彭祖）、颜（安乐）。皆今文立学者也。费氏古文《易》，古文《尚书》，毛《诗》，《周官》，《左氏春秋》，皆古文不立学者也”（《经学通论》）。其时，今文经学为朝廷所尚，盛行于世。西汉中叶后，因其拘于师承家法，流于繁琐碎妄，今文学渐衰。东汉初，光武帝改王莽新政，曾恢复设立今文十四博士。东汉末年，何休作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，倡导“三世”说，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最后代表人物。此后郑玄网罗众家，遍注群经，古文经学兴而今文经学渐消。清代中叶后，以庄存与、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承接今文经学传统，发挥春秋公羊学，议论世事，干预时政。继起者又有龚自珍、魏源、廖平、康有为等，今文经学又一度兴起而成为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根据。

古文经学

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流派。与“今文经学”相对。所据经典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，与今文经籍的隶书写法不同，故名。汉初无古文经学，“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而得古文《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又有河间献王刘德也向朝廷献其所得古文经传。其时古文经传有《费氏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周官》等。但古文经传藏于汉代秘府，不立官学，仅于民间私相传习。西汉末年，刘歆欲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诸古文经，遭今文经博士反对。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，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。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欲为古文《费氏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置博士，遭博士范升反对，并奏《左氏》错失十四事，不可采三十一事。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，认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，其书弘美，宜立博士，光武帝乃立《左氏》博士。诸儒多次争论于朝廷，终又罢废。汉章帝时，贾逵作《长义》四十一条，为古文经张目。博士李育作《难左氏义》四十一事，以《公羊》难逵。汉章帝接受贾逵主张，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四经遂行于世。服虔、马融、郑玄等经学大师均推尚古文，马融以古文经学授郑玄，玄则遍注群经。晋王肃解《毛诗》、王弼注《易》、杜预著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，古文经学始独树一帜，而今文经学大衰。古文经学训诂简明，不凭空臆说，对经书字句、篇章、立意及典章制度、人物评论均和今文经学迥异。偏重名物考证，倡文字学和考古学，后世又称“汉学”。对六朝、隋唐以至清代经学皆有影响。明清之际顾炎武高标“舍经学无理学”，倡经籍研究，至乾嘉时期古文经学大盛。

汉学

又名“朴学”。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。详“古文经学”。指清代推崇汉儒朴学风尚，致力于名物训诂的学派。与“理学”相对。详“考据学派”、“乾嘉学派”。

朴学

即质朴之学。《汉书·儒林传·欧阳生传》：“吾始以《尚书》为朴学，弗好。”后为汉代古文学派所治学问的概称。详“古文经学”。指清

代考据训诂之学。详“考据学派”、“乾嘉学派”。

新学

指西汉末王莽新朝时刘歆所倡古文经学。西汉哀帝时，歆欲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诸古文经于学官，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有别。因遭今文博士反对而未行。至王莽新朝，歆任“国师”，遂立古文经博士。东汉时古、今文经学论争不断。近代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谓刘歆所立经书为伪，称其所倡古文经学是为王莽新朝效力的新莽之学，故名。指北宋荆公（王安石）新学。指“西学”，即近代由西方传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。与“旧学”（中学）相对。

郑学

又名“通学”。东汉时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学派。东汉初，古今文经学争论不休，“遂令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”（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）。郑玄既学今文《易》和公羊学，又从张恭祖、马融学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等古文经，博通古今。遂以古文经学为基础，兼收今文经学，罗括大典，遍注群经，所注有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大传》等。突破西汉经学的师承门户、学派壁垒和家法传统，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，效学者日增而大行于世，使古今文经学之争渐消，后世遂有“郑学”（通学）之称。其代表人物还有孙炎等。

王学

魏晋时经学中的王肃学派。与“郑学”对立。肃崇奉贾逵、马融的古文经学，根据马融学说对古文各经进行注解。郑玄兼采今文学说，为王所恨。遂伪造《圣证论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，借孔之名驳郑。时“郑君名重天下，肃以为必假圣训乃足以夺其席”（《皮锡瑞《圣证论补评·自序》）。所注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等，在晋代列于学官，立有博士。今失传。因其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，故借朝廷支持而盛行，一度压倒“郑学”。东晋后逐渐衰微。

名理学

东汉末，三国初期的学术流派。名，名称、概念；理，事物的条理、准则。《经法》中有《名理》篇，“审察名理”，“循名究理”等观点，认为“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……乃得名理之诚”。汉末清议常谈“名理”问题。曹魏欲建立一个名理合、官职称的政权，“名理”之学随之崛起。司马氏擅权后，名理相悖，君权形同虚位。“名理”之学遂与玄谈相结合，摈弃世务，专言本末、体用、有无、性命等抽象玄理，成为玄学之滥觞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钟会传》：“及壮，有才数技艺，而博学精练名理。”《晋书·范汪传》：“博学多通，善谈名理。”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：“裴仆射（ ）善谈名理，混混有雅致。”《南史·齐桂阳王铄传》：“时鄱阳王铄好文章，铄好名理，人称为鄱桂。”谓辨别事物的是非、道理。与“逻辑”相当。明李之藻翻译葡萄牙人的逻辑学讲义，即将书名译为《名理探》。

玄学

魏晋时期的主要学术思潮。以老庄思想注释《周易》，时称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为“三玄”。玄学家大多是所谓名士，以出身门第、容貌仪表、行为放荡相标榜，以“玄”为“清谈”内容，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色彩，提出了有无、本末、体用、动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，对唐宋时期教育

思想有重要影响。当时在教育方面的论辩，集中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。何晏、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。阮籍、嵇康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向秀、郭象持“名教即自然”。裴 反对“以无为为本”，提出“崇有论”，维护礼制，认为“礼制弗存，则无以为政”。

南学

南北朝时南朝的经学。与“北学”相对。其代表人物有皇侃、费昶等。南朝经师，承袭魏晋学风，崇尚清通简要。《周易》用三国魏王弼注，《尚书》用伪孔安国传，《左传》用西晋杜预注（至于《诗》、《礼》，则南、北同用郑玄笺注）。讲经兼采众说，郑（玄）王（弼）并用，不拘家法，随意发挥。阐发精义，贵有心得。辞义简括，标举大旨，一反两汉繁琐支离的学风和阴阳五行的神秘传统。又受佛教影响，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、讲义，比经注更为详尽，为唐孔颖达等编撰《五经正义》的依据。又就《礼记·中庸》发挥天命心性学说，为宋代理学渊源。《北史·儒林传序》称：“南人约简，得其英华（要义）；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。”传世的有皇侃《论语义疏》。

北学

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。与“南学”相对。代表人物有徐遵明、熊安生等。北朝经师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三礼》都采郑（玄）注，《左传》用服虔注，《公羊传》用何休注。学风较保守，拘于章句训诂，恪守东汉旧说，崇尚繁琐考证，不愿自出新义。《北史·儒林传序》：“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。”所撰经注，清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有辑本。

宋学

主要指宋代理学派别。与“汉学”相对。着重阐释儒家经典义理兼及“性命之学”。主要派别有二程、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、叶适永嘉学派、陈亮永康学派、吕祖谦金华学派等。各派均执其“义理”，相互争鸣。陈亮、叶适主张为学须能经世致用，提出兼采百家之学的教育主张。强调纲常伦理教育的程朱理学斥之为“向外走作”。就天理人欲、王霸义利诸问题，朱熹与陈亮书信往复多所论辨。朱熹与陆九渊又有不同，前者以“理”为本体，重“下学”功夫，以上达天理；后者言“心即理”，倡“易简工夫”，而直指本心。清江藩《宋学渊源记》：“为宋学者，不第攻汉儒而已也，抑且同室操戈矣。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，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”。近人皮锡瑞说：“且宋以后，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，说经之书，已多空衍义理，横发议论，与汉、唐注疏全异”（《经学历史》）。清初，为汉、宋兼采之学。乾隆以后，许（慎）、郑（玄）之学复盛。

义理之学

指以阐发义理为主的经学。参见“宋学”。

理学派

宋明儒家哲学和教育派别。因治经强调阐发义理，故名。参见“宋学”。

濂洛关闽

指宋代理学的四个派别。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，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。

道学

有广、狭二义之分。广义而言，同理学，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家经书的义理为特点之义理之学，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。狭义而论，专指程朱一

派的理学思想。以继承维护孔孟之道为己任，强调道统，故名。北宋已有“道学”之名，张载说：“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，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”（《答范巽之书》）。程颐称其兄程颢“倡明道学”（《祭李端伯文》）。南宋朱熹等大加推崇，称二程之学为道学正传，“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，可谓盛矣”（《程氏遗书后序》）。朱熹所编《伊洛渊源录》，即是一部较系统的道学传，列有周、程、邵、张及其弟子，把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“功利之学”、陆九渊兄弟为代表的“心学”等，均排除在外。朱熹晚年，因政治上受排斥，“道学”曾一度被斥为“欺世盗名”的“伪学”。朱熹死后不久，道学即受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表赞，成为官方御用哲学。元代脱脱在修《宋史》时，特立《道学传》，仿《伊洛渊源录》例，收有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、朱熹、张栻及其弟子，并将陆九渊、吕祖谦、陈亮等列入《儒林传》，以示隆道学之意。

象数学派

指以邵雍、邵伯温为代表的学术派别。“象数”两字源于《左传》所记。“龟，象也；筮，数也。物生而后有象，象而后有滋（生），滋而有数”（《僖公十五年》）。是派据《易传》中有关八卦的解释和道教某些思想，构筑其宇宙生成图式和伦理道德学说。认为“太极”是宇宙本源：“太极一也，不动（清何梦瑶注：‘不动当作动而’）生二，二则神也（何梦瑶注：‘两在而不可测也’）。神生数，数生象，象生器”（《皇极经世·观物外篇》）。“有太极，则两仪、四象、八卦，以至于天地万物”（《宋元学案·百源学案下》）。太极是宇宙万物之本源，经数、象化生万物，有物之后，其本体，“未尝污损，自古及今，无时不存，无时不在。万物无所不禀，则谓之曰命，万物无所不本，则谓之曰性，万物无所不主，则谓之曰天，万物无所不生，则谓之曰心。其实一也。古之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尽心知性以知命，存心养性以事天，皆本乎此”（同上）。提出“以理观物”、“以物观物”等认识论命题。强调内省、顿悟。所著《皇极经世书》，奠定宋明象数学派之规模，与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、张载《正蒙》互有相通之处，同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提供本体论的哲学论证。其所持“安闲乐道”人生态度，对宋明理学家有深远的影响。著名象数学者，宋有王湜、张行成、祝泌、锺过、廖应淮，明有朱隐老、黄畿，清有王植、何梦瑶等。他们的主要著作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均有著录。

濂学

亦称“濂溪学派”。以北宋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派别。因敦颐居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濂溪而得名。以《周易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学说的某些因素，著《太极图说》，提出“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”，“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”的宇宙生成图式。以为“太极”落实到“人极”，便是纯粹至善的“诚”，从宇宙论的高度来统摄道德人性。断言人性本是善的，但由于与外物接触不免染有恶的一面，教育目的即是去恶从善。通过主静、窒欲、迁善改过等修炼工夫，使受教育者符合“中”、“正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的做人准则，达到“诚”的道德境界，自觉遵循和信奉儒家纲常名教。二程自称“受学于周茂叔（周敦颐）”，但并不推崇他。南宋张栻、朱熹论“道统”将其上接于孟子，朱熹所撰《伊洛渊源录》将其列为卷，肯定其开理学先河的地位。主要学者有程珦、周文敏、傅耆等。

关学

以北宋张载为首的理学派别。因载为关中人，又讲学关中，故名。又因其曾侨居郿县横渠镇，学者称“横渠先生”，故又称“横渠学派”。提出“太虚即气”的元气本体论，论述了“一物两体”的对立统一关系。在认识论上，提出人的认识必须“由内外之合”而成；又认为“德性所知，不萌于见闻”。提出“天命之性”与“气质之性”，并认为教育的任务在“变化气质”。强调“知礼成性”、“躬行礼教”，学以用世。读书始于《六经》，尤重视《三礼》、《易》。提倡“博闻强记”，“真履实践”，“以实用为贵，以涉虚为戒”。主要成员有其弟张戡，兰田吕大防、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临，武功苏昞、游师雄，彬州范育、张舜民，长安李复等。关学之盛，与洛学、濂学形成鼎峙之势，载死后，兰田三吕转师二程，再传“寥寥”，但学统未曾中断，元有杨奂，杨天德、杨恭懿、杨寅父子孙三人，肖、同恕等。明有吕柟、冯从吾等。清初有李颢等。在近七百余年的传述与发展过程中，关学学者虽分别受程朱、陆王等学派影响，观点互异，但仍然保持着“躬行礼教”的“崇儒”学旨和重视“实学”、“实践”的学风。

洛学

以北宋程颢、程颐兄弟为首的理学派别。因二程为洛阳人，故名。程颢的《识仁篇》、《定性书》，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，奠定理学的理论基础。提出以“理”或“天理”为宇宙本原，“万物皆是一理”（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）。完成儒学向理学之过渡。首创“性即理”说。继承张载人性观点，分性为“天命之性”与“气质之性”，并称“气质之性”为“才”。“性即是理。理自尧舜至涂人，一也。才禀于气，气有清浊，禀其清者为贤，禀其浊者为愚”（《宋元学案·伊川学案》）。故“才则有善与不善，性则无不善”。教育的作用和任务即在“变化气质”。又析心为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。“人心，私欲，故危殆；道心，天理，故精微。灭私欲，则天理自明矣。”（《程氏遗书》第二）。倡导“言学便以道为志，言人便以圣为志”，“君子之学，必至于圣人而后己”（《宋元学案·伊川学案》）。提出“涵养须用敬、进学则在致知”的为学纲领。主张“知先行后”，“致知在格物”。“格物”的主要途径是读圣贤书，尤重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四书。程颢还强调“仁”为“心之理”，主张通过主敬涵养功夫“识仁”，达到“以天下万物为一体”的精神境界。“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；圣人之心，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”（《定性书》）。主要人物有杨时、谢良佐、游酢、吕大临、刘仲良、刘安礼等。程颢观点为南宋陆九渊、明王守仁继承、发展，形成“陆王学派”。程颐观点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发展，形成“程朱学派”。

荆公学派

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学术派别。亦称“荆公新学”，提出“万物一气”的命题，认为“气”生成“五行”，构成万物。承认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，能认识世界万物，“天下之事，固有可思可为者”（《致一论》）。圣人亦可学而成，王道当可求而致。追求“德政”理想，相信“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，则天下莫不化之也”（《王霸论》）。欲从儒家经书中寻找“变法”理论依据，与子王雱及吕惠卿重注《诗》、《书》和《周礼》，合称《三经新义》，并于熙宁八年（1075）颁布于学校，成为法定教材，以统一国人思想。以“天命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”的政治气魄进行变法。主张培养“为天下国家之用”的经世人才，罢无用之诗、赋，用经义、论、

策取士。学校改革以务实为归旨，创“三舍法”，严明考核和管理制度。学派成员王安礼、王安国、王雱、吕惠卿、陆佃等，均能恪守新学要旨，各有作为。后世褒贬不一。全祖望说：“荆公解经，最有孔、郑诸公家法，言简意赅。惟其牵于《字说》者，不无穿凿。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，不自知其为累也”（《宋元学案·荆公新学略》）。其学术主旨为南宋事功学派所继承。

蜀学

指以宋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三人为代表的学术派别。因系蜀（今四川）人而得名。其成就主要在文学艺术方面，苏轼之散文、诗词、书画，时称一绝。对后世文学教育，影响很大。在学术上倡导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，既异于洛学，又反对新学。但在人性观点上，又强调“情”。认为“圣人之道，自其本而观之，则皆出于人情”（《中庸论》）。“礼之初，始诸人情”（《礼以养人为本论》）。较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。程朱诸儒对其颇多微辞。清全祖望说：“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，甚矣”（《宋元学案·荆公新学略序录》）。主要人物有张耒、秦观、黄庭坚、晁补之等。

闽学

指南宋朱熹为代表的闽中理学派别。发端于二程弟子杨时、游酢，中经罗从彦、朱松、李侗，至朱熹集理学大成。朱熹之后的闽学著名学者有黄榦、陈淳、真德秀、熊禾、吴海、陈真晟、蔡清、陈琛、林希元等，都热衷于按朱熹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创建书院，收授讲学，阐述朱子理学，并有所修正和发展。参见“程朱学派”。

道南一脉

指以杨时发端、朱熹集大成的闽学。杨时为二程及门弟子，“及归，颢目送之曰：吾道南矣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。其后由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及其弟子们所一脉相传。清人张伯行说，“道南一脉，代代有传人”（《鹿洲初集·旧序》）。参见“闽学”。

程朱学派

北宋二程（颢、颐）和南宋朱熹理学派别的合称。又称“程朱理学”。与心学（陆王学派）对立。朱熹集濂学、关学、洛学之大成。断言“理”先天地而生，是宇宙万物的本源。赋予伦理的属性。“宇宙之间，一理而已……其张之为三纲，其纪之为五常”（《朱文公文集·读大纪》）。遂使封建“三纲五常”上升为“天理”的高度。继承发展张载、二程人性观点，认为人性是“天地之性”与“气质之性”，人心是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的双重构成，故教育作用即是“复性”和“尽心”，不仅要变化先天的“气质”之偏以恢复“天地之性”，而且要消除后天的物欲和私欲对“人心”的蔽障，而使“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”（《中庸章句序》）。从而明确提出以“存天理，遏人欲”为旨归的教育纲领，追求封建人品之完善。宣扬“孔颜乐处”，既反对佛教“逃名”遁世的人生态度，又严厉抨击俗儒热衷科举、刻意求名和忘本逐利的倾向。认为个体对封建纲常伦理的自觉自愿是应举干禄的首要条件。为学主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”（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）；“主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”（《宋元学案·晦翁学案》）。尤重视“就日用间致其下学之功”。提倡读书，推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四书。对读书方法，朱熹曾作过系统的总结，后人称为“朱子读书法”。自南宋末起，程朱学派被御定为学术正统。

考亭学派

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。建阳考亭为朱松生前选定之地，熹承父志自绍熙三年（1192）至庆元六年（1200）定居于此并建书院讲学，故名。时著名弟子有蔡沈、陈淳等。熹居考亭所撰著作有《周易参同契考》、《太极通书义》、《易本义启蒙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书集传》、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、《通鉴纲目》、《韩文考异》等，其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完成。因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“党争”，该派曾一度被打成“伪学”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，宋理宗赵的诏令“崇奖”，理学肯定其承继孔孟之学的道统地位。朱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参见“闻学”。

湖湘学派

以南宋胡宏、张栻为代表的理学的一派。渊源于二程、谢良佐。因其主要学术活动在洞庭湖和湘江一带而得名。认为“性是宇宙的本源，‘性也者，天地所以立也’（朱熹《知言疑义》）。”“理”只是在于内“性”的范畴，并不具备本体意义。心、情、欲均为性之不同表现，“性譬诸水乎，则心犹水之下，情犹水之澜，欲犹水之波浪”（《知言·往来》）。反对以“善恶”言性，认为人性仅有“好恶”之分，“好恶，性也。小人好恶以己，君子好恶以道，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”（《知言疑义》）。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自然性，认为人皆有情有欲，“圣人”亦所难免，关键是“圣人发而中节，而众人不中节也”（同上）。主“天理人欲，同体异用，同行异情”（同上）。即二者同以“性”为“体”，发而中节与否，则有“异用”之分。教育目的就是学做“圣贤”，明体达道以经世致用。重视践履。谓“学，行之，上也；言之，次也；教人，又其次也”（《知言》卷六）。此派多非闭门空谈之士，而有学道力行之风，在抗金行动中有实际表现。

心学派

即*陆王学派。南宋陆九渊首创，明王守仁集大成。他们都把“心”看作世界的本原，认为“圣人之学，心学也”（王守仁《象山全集·叙》）。后人称此学派为心学派。

槐堂三陆

指南宋心学家陆九韶、陆九龄、陆九渊兄弟三人。因曾在家建“槐堂”讲学，故称。清全祖望云：“三陆之学，梭山（即九韶）启之，复斋（即九龄）昌之，象山（即九渊）成之”（《宋元学案·梭山复斋学案》）。参见“心学派”。

事功派

南宋兴起的学派。源于王安石“为天下国家之用”的实用思想，主要包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。乾道、淳熙间形成鼎盛之势。与理学相抗衡，认为理学家空谈“性与天命”，对其“静坐”、“存养”功夫尤为不满。倡言功利，赞许“三舍法”，主张习百家之学、考订历代典章名物，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功利的人才。其学说开启了颜元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的启蒙教育思想。

吕学

南宋吕祖谦所创学派。学者以其为婺州人，亦称为“婺学”。婺州治所在金华县（今浙江金华），故又称其为“金华学派”。吕氏曾与朱熹、张栻齐名，号称“东南三贤”。乾道、淳熙后，以独立学派与朱、陆鼎立。《宋元学案·东莱学案》载全祖望评论：“宋乾淳以后，学派分而为三：朱学也，

吕学也，陆学也。三家同时，皆不甚合。朱学以格物致知，陆学以明心，吕学则兼取其长，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。门庭径路虽别，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。”吕兼取朱、陆之长，倡导致用之学，主张“讲实理，育实才而求实用”。重史学、文献学。主要人物有吕祖俭、吕祖泰、楼昉等。参见“吕祖谦”。

金华学派

见“吕学”。

婺学

见“吕学”。

永康学派

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的学派。因其为婺州永康（今属浙江）人，故名。因学者称亮为龙川先生，故又称“龙川学派”。与永嘉学派并称为事功学派。与朱熹为代表的性命之学相对立，主张义利双行，王霸并用。陈傅良指出其学术思想特点是：“功到成处，便是有德；事到济处，便是有理”（《止斋文集·致陈同甫书》）。力图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，“开物成务”。一时从学者甚众。主要人物有喻民献、喻偁、喻南强、吴深等。参见“陈亮”。

永嘉学派

南宋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等为代表的学派。皆为永嘉（今浙江温州）人，故名。以事功经世为重，与永康学派同称事功学派。清全祖望说：“永嘉之学统远矣，其以程门袁氏（袁溉）之传为别派者，自艮斋薛文宪公（薛季宣）始。艮斋之父学于武夷，而艮斋又自成一家。……其学主礼乐制度，以求见之事功”（《宋元学案·民斋学案》）。永嘉之学，原出伊洛。其弟子陈傅良发挥“实事实理”思想，刻苦钻研经制，对自三代两汉而后的井田、王制、兵制兵法详尽考究。叶适承继薛、陈，系统总结功利之说，又与傅良门人蔡幼学代表永嘉学派与朱、陆论争，遂使永嘉之学与理学、心学成鼎足之势。永嘉学派重历史文献，要求于经史文献中掌握治道。黄宗羲云：“永嘉之学，教人就事上理会，步步着实，言之必使可行，足以‘开物成务’。盖亦鉴于一种闭目合眼朦瞳精神启附道学者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”（《宋元学案·艮斋学案》）。其说在当时影响颇大，引起朱熹不满，抨击“永嘉、永康之学，大不成学问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二）。

鲁斋学派

以元许衡为代表的学派。衡号鲁斋，故名。该派崇信程朱之学，并广泛传播于北方。强调“纲常不可亡于天下，苟在上者无以任之，则在下之任也”。学术观点多因袭程朱思想。肯定“每一事，每一物，须有所以然与所当然”（同上）。重视通过为学工夫去探究“所以然与所当然”之“理”，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辩，此解说个穷字。其所以然与所当然，此说个理字”（同上）。有一定程度的心学倾向，反对“将人心上原无底强去安排与他”。重践履，认为“称人之善，宜就迹上言”。奉朱学如神明：“《小学》、《四书》，吾敬信如神明，能明此书，虽他书不治可也”（同上）。全祖望说：“许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学，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不可诬也”（同上）。主要人物尚有姚枢、窦默、姚燧、耶律有尚等。姚枢以“修身，力学，尊贤，亲亲，畏天，爱民，好善，远佞”，为“治国平天下之大经”。窦默尝“首举纲常”，答元世祖“治道”之问。姚遂则因“穷理致知，反躬实践，为世名儒”。耶律有尚则“五居国学，为师表者数十年”，扩大了理学教育的社会影响。